

强奸案频发,这个标签已经成了印度社会的一大“黑点”,作为受害者的印度女性,似乎永远处于弱势地位。但在印度的一个村子里,有位坚强的女性却以一种近乎极端的方式发起了反抗。被称作“带枪阿姨”的她,每天端着一支旧式步枪在附近巡逻,承担起保护全村女性的职责。

印度的“带枪阿姨”

17年了,她保护全村的女孩免遭性侵



持枪的莎罕娜·贝古姆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最初买枪为自卫

今年42岁的莎罕娜·贝古姆住在印度北方邦的沙贾汉布尔,她身着印度传统服装,平时靠种田、捕鱼为生,看上去和一般女性没什么不同,但她手中的家伙却让人望而生畏:那是一杆步枪,既是她的防身武器,也是她保护全村女性的法宝。

在印度,女性至今仍处于弱势地位,频发的强奸案更是让很多女性沦为无法反抗的受害者。正因如此,莎罕娜被村中的女性视为保护神。但她最初持枪,只是为了保护自己。

17年前,莎罕娜的丈夫去世,带着4个孩子的她成了寡妇。“就因为一起家庭纠纷,我的丈夫被他弟弟射杀。我真不知道谁该怪谁。”她说。

那时,莎罕娜只有25岁,她最小的儿子才出生3天,她的小女儿也不过两岁。“我们孤儿寡母无依无靠,不管是出门买衣服还是食物,我经常有种不安全感。我害怕会被人攻击,如果我死了,谁还会保护我的孩子?”

莎罕娜说,她当时曾想过向警察求助,但她也亲眼见到了警方对女性的诉求视而不见。靠人不如靠自己,她索性决定买把枪来自卫。

于是,1999年,莎罕娜用攒下来的15000卢比(约合1517.8元人民币)买下了一杆步枪,并获得了持枪许可。她在自家后院的空地上练习射击,很快就“自学成才”。

成为村里女孩的“妈妈”

刚开始持枪时,有不少人对她说三道四,可莎罕娜并不在乎。“我自己过得很好,总有一天人们会理解我。”

莎罕娜是对的,而且随着她将带枪出门变成常态,村民甚至开始向她寻求帮助。

如今,莎罕娜的两个女儿一个22岁,一个19岁,最小的儿子今年也17岁了,她的孩子已经过了需要保护的年龄,但莎罕娜依然习惯带枪出门——她将保护范围从自己和女儿扩展到了全村需要保护的女性。不只是性侵案件,当男人做出其他触犯法律的恶行时,她也会把他们带到警局。

这一方式虽然简单粗暴,却十分有用。莎罕娜说,枪对她而言,“既是丈夫,也是父亲”。“不管走到哪儿,我都会带着枪。在我们村里,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敢找女人的麻烦,因为他们知道,(如果他们那么做了,)我会开枪。”莎罕娜说,“母亲的职责是保护孩子,而我就像这个村子里所有女孩的母亲。”

她“分担”了警察的工作

实际上,这些年来,莎罕娜没有朝任何人开过枪,枪本身的威慑力就足以让作恶的男人跟着她乖乖走到警局受审。“但需要开枪时,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。”

她甚至承担了警察的部分职责,这听起来虽然有点荒诞,但当警察无所作为时,无可奈何的受害者只好找莎罕娜主持公道。

2013年,村里有户人家的小女孩惨遭强奸,她被三个男孩强奸了两天,女孩的家人报了警,可警察却不愿意管这事儿,绝望之下,受害人一家找到了莎罕娜。

“我带他们去了警察局,要求警方接手这起案件,否则就向上级警局申诉,直到有人管为止。”莎罕娜说,“警察最终逮捕了强奸犯。”

不过,莎罕娜毕竟不是圣人,她也做了一件未必恰当的事儿:在警察局里,她提出要同这起强奸案的主犯见面。当着那个主犯男孩的面,莎罕娜要求他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”。这起事件的结局是,主犯男孩娶了受害女孩,虽然他们现在日子过得还不错,但从理性的

角度来看,并不是每一个强奸犯都有成为受害人文夫格的资格;遭到强奸的女孩,也不是非得嫁给那个让她承受过痛苦的施暴者。

将保护进行到底

多年来,“带枪阿姨”的存在让这个地区的性骚扰和强奸案数量得以减少。由于名声在外,每个星期,莎罕娜还会去附近村庄,帮人们解决如财产纠纷、性骚扰或者安全等问题;她还经常为当地的“袋鼠法庭”出谋划策。“袋鼠法庭”是印度乡镇地区的一种政治形式,由当地颇有声望的长老组成,解决小镇范围内涉及个人和村庄之间的争议。

当地人对这位“带枪阿姨”充满了感激。20岁的农村民萨哈拉·巴努说,没有男人敢轻浮地对待她们,“我经常听说全国范围内发生的那些性骚扰和强奸案,但因为我们有‘带枪阿姨’,我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。”她说,“多亏了她,女孩可以平平安安地上学、工作。我不会离开这个村子,因为我不知道哪里还会有这样一位阿姨,能始终保护我们。”

尽管莎罕娜已经非常努力,但以她一人之力,终究还是杯水车薪。她所在的北方邦仍是印度性犯罪最严重的地区之一,当地犯罪记录局的数据显示,从2014年到2015年,北方邦的强奸案数量增加了160%,从3467起增至9075起。进入2016年以来,已有11012起强奸案发生,另有4520起性骚扰事件记录在案。

莎罕娜没有灰心,她说:“在我的国家,针对女性的犯罪数量持续增加,我感到很难过。恐惧写在我遇到的每个女性的脸上,我真心希望我们能解决这些问题。”

“我希望女性不再是一个容易受害的群体,她们能和男人一样得到尊重。”她说,“就算我只剩一口气儿,也会继续保护女孩的人身安全。”

个人意见

30年后再续“一镜之缘”

张文 编译

“有些人一点儿都没变,有些人已经认不出来了;有些人头发掉光了,有些人还有头发;有些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,有些人正经历低谷。”博尔兹的照片见证了时光的流逝,在改变中让人体会到了生活的奇妙。



30年前的托尼和萨利(上)和现在的他们

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,英国人克里斯·博尔兹喜欢在他生活的城市里走来走去,把镜头对准来来往往、形形色色的路人,拍下了很多照片。后来,他成了一名急救人员,有了3个孩子,日子一忙,爱好也丢下了。那些已经蒙尘的照片,直到2009年才被翻开。博尔兹将当年拍摄的老照片寄给了当地报纸,没想到,读者很爱这些照片,有些照片里的主人公还认出了当年的自己。“我忽然想到,让这些人重新聚在一起拍张照片肯定很有意思,于是我下定决心找到更多人。”

这七年来,博尔兹煞费苦心联系和他有过“一镜之缘”的人,将他们请回当年的拍摄地点,用当年的姿势重新拍下134张照片并集结成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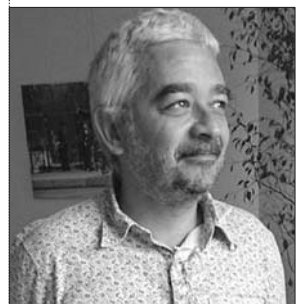
他找到的第一对拍摄对象是托尼和萨利。1980年,博尔兹拍摄了一对在车站吻别的恋人,那时两人刚刚20岁出头。一年后,他俩结婚了,后来还有了两个孩子。这对夫妻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拍了,还是托尼的爸爸看到报纸,认出了他俩。现在,他们的照片成了博尔兹新书的封面。

“有些人一点儿都没变,有些人已经认不出来了;有些人头发掉光了,有些人还有头发;有些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,有些人正经历低谷。”博尔兹的照片见证了时光的流逝,在改变中让人体会到了生活的奇妙。

写书回忆巴黎恐袭

张文 编译

最难的是要在女儿面前装作若无其事。“我处于崩溃边缘,但是每天还要去学校接女儿。”雷本伯格写道,“我必须将我破碎的一面藏好,但我不是一个好演员。”



戈里·雷本伯格

戈里·雷本伯格在自家经营的餐馆里,顾客在就餐,桌子上还点着蜡烛。突然,枪手出现在平台上,向着雷本伯格的老主顾开火。19人丧生,其中有8人是他的好朋友,还有一人是雷本伯格的前妻贾米拉——一名穆斯林女性。

这起枪击案是2015年11月13日在巴黎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中的一起。一年过去了,雷本伯格写了一本书,记录枪击案发生后的生活。他说,想回归日常生活非常困难。好几个月里,他精神恍惚,参加的葬礼一个接一个,他不得不在家人、朋友和心理专家那里寻求帮助。

最难的是要在女儿面前装作若无其事。“我处于崩溃边缘,但是每天还要去学校接女儿。”雷本伯格写道,“我必须将我破碎的一面藏好,但我不是一个好演员。”他说,小时候不明白为什么爷爷奶奶不愿意说他们在战争中经历了什么,现在自己知道了原因。“地狱不是值得再去一次的地方,去一次就付出一次代价。”

雷本伯格希望通过写书来保存自己和女儿一起走出悲剧的记忆,也记住女儿问他的尖锐问题:“爸爸,妈妈还有可能再回来吗?”

雷本伯格决定靠自己重新经营餐馆。今年3月,装修一新的店面开门迎客——不过顾客回归得很慢。“法国必须尽可能地恢复,她会的。”雷本伯格说。